

## 第四章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主題呈現

園亭記散文原是以記敘園亭建造修葺的過程、歷史的沿革、花費之時日與工資等為主，但宋代以後，這類作品不僅是單純的記述營造過程而已。因遊賞園池、登臨亭臺，觸目所見盡是山水景觀，士人由景生情，藉此抒發懷抱，或闡發議論，或狀寫景物，也因此增加園亭記散文的藝術價值。

北宋園亭記散文並非以記錄園林沿革經過為主要內容，在一篇園亭記散文裡，其內容常涵蓋了許多面向，有園林景觀的描繪、與賓友宴遊休憩的閒適、作者情志的抒發、頌揚上恩、宣揚與民同樂的思想，或藉由題名闡發對園主的期望與惕勵等，蘊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而這些面向，即是園亭記散文所呈現的主題。何謂「主題」？

文學作品的主題是指作品通過藝術形象的描繪所顯示出來的中心思想，也稱主題思想。<sup>1</sup>

主題乃是一篇文學作品的靈魂，是作者欲藉由文學作品所傳達的思想、主張，亦即中國文人所謂的「立意」。

(1) 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兵衛。(杜牧〈答莊充書〉)

<sup>2</sup>

(2)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李漁《閒情偶寄·卷一·詞部曲上·結構第一·立主腦》)<sup>3</sup>

杜牧和李漁均指出了主題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一篇文學作品皆須有主題、立意，否則將淪為「言之無物」，空有華辭藻飾的作品罷了。

北宋園亭記散文蘊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所呈現的主題亦為豐碩，試歸納分析如下。

<sup>1</sup> 參閱黃展人等編：《文學理論》，高等學校文科教材，頁 43。

書中亦提及，主題並非僅能有一個，一些體裁比較宏大的作品，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廣闊，體現的思想意義和作家的主觀評價是多方面的，這就形成了「多主題」。頁 44。

<sup>2</sup> 《全唐文》第 8 部，卷 751。

<sup>3</sup> 參閱《李漁全集·卷三·閒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年。

## 第一節 頌德同樂

北宋士大夫常在官署之側，覓一空地建堂立亭、修築園林，此園通常具有多重之功用，一方面為官吏公務之暇休憩遊覽之所，一方面亦是官吏公退休沐等時候的居家生活空間，除此之外，亦是官員招待賢達士紳等賓客的場所，也作為當地居民遊樂之處所。

園林既是讓官吏休憩、宴遊賓客之處，又是開放民眾觀遊之所，似乎有令人耽溺於逸遊而荒廢職務之慮。因此，北宋士大夫多方面為園林之興建，尋找合理之理由：

- (1) 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乘舳舻由真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餼牽積饋雖厚，不得盤桓上舍，優遊山水之間，地主之禮，猶為缺哉！（余靖〈韶州真水館記〉）<sup>4</sup>
- (2) 人足於衣食，其情閒暇，則思有所適，以寓一日之樂焉。（揚蟠〈眾樂園記〉）<sup>5</sup>
- (3) 人之情，久居勞苦，則體勤而事怠，過佚則志荒而功廢，此必然之理也。善為勸者節其勞佚，使之謹治其業，而不失休游和樂之適，斯有方矣。（田況〈浣花亭記〉）<sup>6</sup>

余靖認為讓來到所治之縣的遊人或使者、賓客等，皆能悠遊於山水美景之中，此亦是為政者須盡的地主之禮。因此，園林之興建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北宋士大夫普遍認為人在豐衣足食之餘，希望有一休閒娛樂之處，乃是人之常情。且人們過勞則理事易倦怠，但是過於安樂則會荒廢抱負與工作。因此，應在勞與佚之間取得一平衡點，使人民能謹慎處理其事業，卻又不失休憩遊賞之樂。此正可解決耽溺於逸遊而荒廢職務之慮。

除此之外，園林的建造亦有宣揚天恩、展現天下承平境況，及讚譽為政者善於治政的寓意。<sup>7</sup>因此，在士大夫的眼中，於官署之側修建園林是不可或缺的。

在這樣的思潮背景之下，園亭記散文的往往呈現出「頌德同樂」的主題，試從「頌揚君恩與政績」、「民安而後官樂之治政精神」、「與民同樂思想的宣揚」三

<sup>4</sup> 《武溪集》卷5；《全宋文》第14冊，卷569。

<sup>5</sup> 《全宋文》第24冊，卷1045。

<sup>6</sup> 《全宋文》第15冊，卷636。

<sup>7</sup>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北宋園林興盛的因素——政治因素：用以宣揚上恩、呈現善於治政」。

方面探討之。

## 一、頌揚君恩與政績

### (一) 頌揚君恩

在北宋園亭記散文中，有不少作品在狀寫登覽之景，或藉題闡發議理之際，往往會先頌揚宋代帝王的恩澤。因為政局的穩定，天下才得以太平，民生因而富裕，才可能有多餘的錢財修建園亭，而百姓才會有閒情逸致遊賞園林。

宋有天命，武廢不興。元元白首衣食於里閭畎畝，而觀游之樂能侈於今日者，四時之澤浸灌百年深也。(王安國〈池軒記〉)<sup>8</sup>

〈池軒記〉指出百姓至今能享有觀遊之樂，是因宋承天命，戰亂不興，人民才得享此德澤。歐陽脩〈豐樂亭記〉中，亦有大段文字讚頌君恩：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剝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氏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守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sup>9</sup>

歐陽脩於〈豐樂亭記〉中讚頌宋朝統一中國和休養生息的功德，使得滁州百姓得以享受到豐年之樂，才能與太守歐陽脩共遊豐樂亭，同享觀遊登覽之樂趣。歐陽脩亦於文中提及，宣揚皇上恩德、與同民樂，是刺守的分內職務。由此可知，修建園亭的確有頌揚君恩之用意。

沈括在〈揚州九曲池新亭記〉中藉由刁公之口頌揚君恩：

公以惠和慈仁康集勞來，直心正身修明百職。文武賓吏各率其職，罔敢怠傲。民卒用寧，歲以大康。乃以吉日巡視宮廟，按垣揆室，曰：「此上聖所以眷錫我邦，休有惠烈，實冒邦土。祠事弗虔，無以報稱。廢徹無所，

<sup>8</sup> 《全宋文》第37冊，卷1587。

<sup>9</sup> 《歐陽文忠公集》卷39；《全宋文》第18冊，卷739。

神惠不歆。」於是墁髹丹髹，弊脫黯黹一新以為瑰麗宏潔。<sup>10</sup>

沈括先贊頌刁公之德、善於治政，因此百姓生活安定，歲收豐厚。刁公巡視宮廟之時，則是頌揚國君恩德，將地方的安定豐裕歸功於天子。刁公因感到無以為報，於是建築一座新亭以彰揚國君的恩澤。

北宋園亭記散文在頌揚君恩之際，呈現了天下承平、社會富裕的境況，因而為興建園林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社會背景與理由。

## （二）頌揚官吏政績

北宋園亭記散文中許多作品是請託他人為之作記，因此，不少園亭記散文中出現了讚揚興建園亭之官吏政績的文字。

- （1） 韶處嶺陬，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以誠應物，庭無留事，日自適於山水之間，乃知為政自有體也。（余靖〈湧泉亭記〉）<sup>11</sup>
- （2） 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昱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余靖〈韶州新修望京樓記〉）<sup>12</sup>
- （3） 履中治江而百職舉，民既安其政，又求有以共樂之，而處善能推其志以就奇曠之賞，凡此皆將傳之不朽。（沈括〈江州攬秀亭記〉）<sup>13</sup>
- （4） 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來往，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歐陽脩〈泗州先春亭記〉）<sup>14</sup>
- （5） 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榮。……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體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李覲〈建昌軍集賓亭記〉）<sup>15</sup>
- （6） 李公宣風阜俗，怡神樂職，以餘力治亭榭，以暇日飲賓友，或宴以

<sup>10</sup> 《長興集》卷 21；《全宋文》第 39 冊，卷 1690。

<sup>11</sup> 同註 4。

<sup>12</sup> 同註 4。

<sup>13</sup> 《長興集》卷 23；《全宋文》第 39 冊，卷 1691。

<sup>14</sup> 同註 9。

<sup>15</sup> 《直講先生文集》卷 23；《全宋文》第 21 冊，卷 914。

樂，既惠且安，引而伸之，河潤九里，政之在物，從可知焉。（胡宿〈流杯亭記〉）<sup>16</sup>

這些頌揚官吏政績的文字，也許出自於應酬之作，但卻可發現，北宋士人認為所謂的「善為政者」，均是先治理好管轄區內百姓之務，使民不擾、地方無災之後，再興建園亭以供自己休憩與百姓遊覽。李觀更進一步提出，在政通人和之後建造園亭，亦須秉持者不浪費、華奢的原則，而這亦是為政愛民之道。從上述文字可知，「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才是北宋士人稱頌的功績。

## 二、「民安而後官樂」之治政精神

園林的興建與遊覽，似乎會有耽溺於遊園而荒廢職務之憂慮；但北宋士大夫於園亭記散文中卻一再的強調園林的修建與遊覽，均是在分內職務已經完滿達成後才致力於此的。

- (1) 敏政者蒞之猶憚弗及，顧予菲劣，豈敢逸豫？蓋夙夜而在公者迄三時矣，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豐，而邑中之園亭得以觀覽。（文彥博〈思鳳亭記〉）<sup>17</sup>
- (2)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范仲淹〈岳陽樓記〉）<sup>18</sup>
- (3) 景佑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考政之始，眾務畢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蘇舜欽〈處州照水堂記〉）<sup>19</sup>
- (4) 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此邦之人，曰維政刑毋枉於直，曰維教化日遷於良。山樵水耘，濟之阜安，陶然大和，歲以有年，邦人怡怡，并尋於娛。（邵亢〈眾樂亭記〉）<sup>20</sup>
- (5) 未數月，事舉政平，時和訟簡。公命僚屬醺於所謂西亭者。（劉公儀〈萬州西亭記〉）<sup>21</sup>

唯治政有成了，北宋士大夫才有餘暇相地建堂、開圃築亭，並逸遊於園林之中。

<sup>16</sup> 《文恭集》卷 35；《全宋文》第 11 冊，卷 466。

<sup>17</sup> 《全宋文》第 16 冊，卷 658。

<sup>18</sup> 《范文正公集》卷 7；《全宋文》第 9 冊，卷 386。

<sup>19</sup> 《蘇學士文集》卷 13；《全宋文》第 21 冊，卷 878。

<sup>20</sup> 《全宋文》第 24 冊，卷 1033。

<sup>21</sup> 《全宋文》第 24 冊，卷 1043。

這是在強調他們多麼認真於治務、用心於職守。他們唯有政通人和之後，才會尋謀一個可供休息宴遊的地方，標榜其「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

歐陽脩和王安國也於園亭記散文中，明白的揭示這樣的治政精神：

(1) 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歐陽脩〈泗州先春亭記〉)<sup>22</sup>

(2) 夫熟慮於治，而使民術術於下，然後得宴休於上，而無愧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者」歟，則君懿不有志是哉！(王安國〈池軒記〉)<sup>23</sup>

歐陽脩讚譽張侯先為民去除災害後，才思及修建園亭作為宴請賓客的勞餞之所，最後才想到此亭亦可作為自己的休憩之處。張侯將除民害視為最重要事務，而將自己的利益擺最後，展現出「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所以歐陽脩才會稱讚他知道為政的道理。王安國則是指出，對於政務須考慮周密再施行，使人民生活和樂，然後為政者才得以宴遊休憩，而不愧孟子所說的「賢者而後樂者」的道理<sup>24</sup>。由此可知，「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來自於儒家「賢者而後樂者」的思想。

因此，官署園林的興建與存在，正如侯迺慧先生所言：「它不代表官吏怠忽職守，放逸享樂；反而積極地標幟著勤政愛民。」<sup>25</sup>官署園林的修建與遊觀，成了北宋官吏政績的表徵，與「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之宣揚。

### 三、「與民同樂」思想的宣揚

官署園林的興建既是為政者政績的表徵，而將此園林提供百姓為閒遐時遊覽之所，亦是官吏政績的表現之一。北宋士大夫認為與民同樂乃是為政者的職責之一：

(1) 近世治蜀以行樂為郡務之一端，蓋壤土迫陜，民齒稠夥，農工趨力，猶水火漂燔之急。(田況〈浣花亭記〉)<sup>26</sup>

(2) 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亦牧守之事也。(呂陶〈重修成都西樓記〉)<sup>27</sup>

<sup>22</sup> 同註 9。

<sup>23</sup> 同註 8。

<sup>24</sup> 見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sup>25</sup> 參閱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頁 197。

<sup>26</sup> 同註 6。

<sup>27</sup> 《淨德集》卷 13；《全宋文》第 37 冊，卷 1610。

〈浣花亭記〉點出了一個現象：因為民生困苦，所以官吏將行樂視為治理郡縣的職務之一。從這一現象可得知，唯待民生安定富裕，使民得以行樂之郡務方能推展實踐。故使人民安康富裕，進而與之共樂，亦是官吏的職責。

- (1) 喜見太平官府，故桂邦之俗，歲時載榼提醪、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為事。(李彥弼〈八桂堂記〉)<sup>28</sup>
- (2) 太守所以宴賓客，而樂與州民共其康寧無事之時也。(鄭俠〈連州新修都景樓記〉)<sup>29</sup>
- (3) 庶乎良辰麗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遊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韓琦〈定州眾春園記〉)<sup>30</sup>

〈八桂堂記〉、〈連州新修都景樓記〉均指出唯有太平官府、地方康寧無事之時，太守與百姓才得以共享宴遊觀覽之樂趣。〈定州眾春園記〉則更進一步指出，太守與百姓於良辰麗節之時，共遊於園林之中，乃能呈現天下太平無事之樂。故「與民同樂」遂成為評定官吏治政成績的指標之一。

因此，北宋官吏於地方安定、民生安利之時，往往會於春日這一風光明媚之時節，開放園林讓百姓得以娛遊享樂：

- (1) 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遨，予命之曰共樂。(梅堯臣〈覽翠亭記〉)<sup>31</sup>
- (2) 每春月花時，大帥置酒高會於其下，五日縱民游覽，宴嬉西園，以為歲事……。(吳師孟〈重修西樓閣記〉)<sup>32</sup>

關於百姓於園林境中悠遊宴賞的熱鬧景象，北宋園亭記散文中亦有詳細的敘寫：

- (1) 歲時出入，燕遨必盛，騎從鼓鑼，歌優雜技，以悅民觀賞，慰其勞苦。……故浣花一出，在歲中為最盛。綵舫方百尾，泝洄久之而下，

<sup>28</sup> 《全宋文》第46冊，卷2017。

<sup>29</sup> 《西塘集》卷3；《全宋文》第49冊，卷2177。

<sup>30</sup> 《安陽集》卷21；《全宋文》第20冊，卷854。

<sup>31</sup> 《宛陵先生集》卷60；《全宋文》第14冊，卷593。

<sup>32</sup> 《全宋文》第31冊，卷1360。

歌吹振作，夾岸游人肩摩足累，綿十里餘。臨溪競張飲次，朋侶歌呼，或迎舟舞躍獻伎。曠夜老幼相扶，挈醉以歸，其樂不可勝言矣。

（田況〈浣花亭記〉）<sup>33</sup>

（2）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游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韓琦〈相州新修園池記〉）<sup>34</sup>

（3）我樂與眾人之樂而申之，為之亭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眾樂」名焉……凡州之人，月惟暮春，聯航接舳，來游其間。環隄徜徉，風於柳楊，夕以忘還。（邵亢〈眾樂亭記〉）<sup>35</sup>

州民於宴遊所進行的活動多樣且熱鬧，官吏為慰勞百姓平日的辛勤，安排了騎從鼓鑼與歌伶、雜技團等，讓民眾觀賞，娛樂其耳目。而民眾亦踴躍參與遊園宴賞之活動，試看「夾岸游人肩摩足累，綿十里餘」、「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游吾園」、「聯航接舳，來游其間」，就可知民眾對遊賞一事之熱衷。民眾或於園內宴飲高歌，或徜徉於柳楊等園栽之間，皆可見其樂在其中，不忍離去之情。這幅百姓宴遊觀覽之歡娛圖象，來自於社會的安定、民生的富裕，官吏見百姓之樂，亦其所樂之事；而官吏或與百姓共遊，亦與民同享遊賞之樂，此「與民同樂」的思想遂已透徹闡發出來。

在「頌揚君恩與政績」、「民安而後官樂」、「與民同樂」等三個層面之下，北宋園亭記散文呈現出「頌德同樂」的主題，亦塑造出北宋士大夫以民政為先、勤政愛民之形象，及在大宋王朝的統治之下，天下承平、安樂的盛世氣象。

## 第二節 憂國憂民的情懷

遊賞園林本是件歡愉之事，但是，北宋士大夫在登覽宴遊之際，往往會興起憂國憂民之情懷。這乃是肇因於北宋時期對文學內容的要求——經世致用，要求文學應肩負起對社會的責任。

自晚唐五代以來，文壇瀰漫著浮艷輕麗之氣，北宋初期亦承襲此綺艷輕靡文

<sup>33</sup> 同註 6。

<sup>34</sup> 同註 30。

<sup>35</sup> 同註 20。

之風。在當時雖有柳開、孫復、穆修等人起而提倡文學改革，鼓吹文學復古運動，然而卻得不到顯著的成效。真正改變北宋初期浮艷的文風，在當代文壇掀起巨大改革與影響的，乃是歐陽脩推動的古文復興運動。

歐陽脩以韓愈的文以明道說為宗旨，強調文學的政教功能，要求文學應負起道德教化和政治改革的作用。他在〈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中提出文學必須反映現實，鍼砭時弊，發揮其社會作用。

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深切，中于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sup>36</sup>

然而，當時的取士制度仍是以詩賦為主。待歐陽脩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考官之時，他便經由改革科舉取士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文學主張。歐陽脩於〈詳定貢舉條狀〉中提出了他認為的理想取士方法：

今先策論，則執經者留心于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sup>37</sup>

在歐陽脩的大力改革，與門下士王安石、曾鞏、蘇軾等人的推動之下，北宋時期的文風為之一變。

因文學以經世致用為標榜，提倡儒學之道統，促使當代士人具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感與道德自覺，開始面對社會現實的問題，企圖以文學創作來反映、改革當代的政治社會問題。當時士人具有強烈的濟世熱情與理性批判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當代的社會、文壇的改變，正如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所言：

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sup>38</sup>

在這樣的文學思潮背景之下，北宋士人即使暢遊於園林之中，卻仍不免興起

<sup>36</sup> 《歐陽文忠公集》卷 67；《全宋文》第 17 冊，卷 698。

<sup>37</sup> 《歐陽文忠公集》卷 104；《全宋文》第 16 冊，卷 689。

<sup>38</sup> 《蘇文忠公全集》卷 10；《全宋文》第 44 冊，卷 1931。

憂國憂民之思，甚至其園亭之興建，根本之意乃是為民：

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於民乎！因於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為敦龐；揭石以寄政，欲編戶曉然論善道也；引美以為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染也；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乎拊略也。（蘇頌〈潤州州宅後亭記〉）<sup>39</sup>

原來，後亭之興建令為政者可以登高以省察民俗，因此即使登覽逸遊，仍不忘治政之事。由此足見為政者時刻繫心於政事，對縣治之用心。

王安石〈石門亭記〉亦在說明朱君「作亭之意」。文中，王安石提出：「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於此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五個問題，以揣度朱君作亭之意。並一一分析作答，最後歸納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個「仁」字。在分析歸納的過程中，亦闡明了為政者應擁有憂國憂民之胸懷：

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其有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sup>40</sup>

朱君所憂在於天下；深入幽山靜谷，求民之所疾憂；以德教化百姓，使民不興頌；呈現出處處憂心民瘼的濟世情懷。這種念茲在茲、不忘民憂的精神，正如同〈潤州州宅後亭記〉所言：即使逸遊於園亭之上，仍不忘民政。

北宋士人在胸懷天下，以天下為己任之時，並不以個人的升遷寵辱為念，仍心繫家國，並擁有「先憂後樂」的恢宏氣度：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范仲淹〈岳陽樓記〉）<sup>41</sup>

<sup>39</sup> 《蘇魏公文集》卷 64；《全宋文》第 31 冊，卷 1339。

<sup>40</sup> 《臨川先生文集》卷 27；《全宋文》第 16 冊，卷 689。

<sup>41</sup> 同註 18。

范仲淹藉由推求古仁人之心，得到古代仁者不會受外物影響的結論。因為他們堅定的意志和人生目標，不會輕易受外物影響，而觸動內心的感情。其所關注的不是個人得失寵辱，而是人民的幸福和國君對政事的推展。因此，古仁人無論在朝為官，或遠離朝政，均不忘憂國憂民。唯有天下百姓皆安居樂業，古仁人才會感到快樂。范仲淹藉古仁人之心，勉勵同被貶謫的滕子京，以古仁人之心為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這些其實亦是范仲淹終身所奉行之準則。

這種「先憂後樂」的精神，在李彥弼〈八桂堂記〉亦可窺見：

彥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蓋數炊秤爨，足以享己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患未萌而人無駭興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圃，敞扉通途，無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為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sup>42</sup>

文中提出，君子之所以優於一般人，乃是因為其懷有「先同其憂，後同其樂」的胸襟。讚揚程公先待地方政事皆完備後，始闢園圃與民同樂，此亦為「先憂後樂」胸懷的展現。故可知「民安而後官樂」的治政精神，實是源於「先同民之所憂，後同民之所樂」的理念。

歐陽脩憂國憂民之胸懷，以國事民生為念的精神，透過曾鞏〈醒心亭記〉闡發出來：

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于上，給足而無憾于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sup>43</sup>

原來歐陽脩所樂之事，並非山水之樂，而是國君悠閒自得，無為而治；百姓豐衣足食，無不滿足之事；學子皆為賢良之才；四夷和草木鳥獸等萬物之生長，各得其宜。這些才是歐陽脩所樂的真諦，只是將之移情投射於山水之樂罷了。

<sup>42</sup> 同註 28。

<sup>43</sup> 《元豐類稿》卷 17；《全宋文》第 29 冊，卷 1261。

北宋士人多懷抱著淑世濟民的使命感，在文學標榜經世致用，有益教化人心的要求下，即使在徜徉悠遊園林之際，發而為文，仍掛懷社會民生與國家之前途。北宋士人以「先憂後樂」之胸襟關懷國家社會，所以往往在百姓得以安樂之後，才讓自己得以暢情於園林之中。「宋代散文更多了一種危機意識，也就更帶了些傷感情緒。柳宗元山水遊記自憐幽獨卻無危機之感，而讀歐陽脩、蘇軾的遊記，其中盛世危機的感嘆卻是瀰漫于心頭，揮之不能去。與唐人相比，宋代文人對人生、社會的洞察更為深刻，但憂患也更為強烈。」<sup>44</sup>正為北宋士人憂國憂民的情懷，下了最好的註解。

### 第三節 隱逸生活的嚮往

北宋帝王對隱士的優待與厚愛，促進了當代對隱逸之風的崇尚。<sup>45</sup>北宋時期，隱士的來源與隱居型態大略有五種。其一，士人歷經求仕失意的打擊後，便隱居山林。其二，仕途不得意而求去的官吏。其三，宋代官僚制度中有些閑官散職，過著類似隱居的隱逸生活。其四，官吏退休後隱居。其五，吏隱，即在朝為官的官吏在思想上追求隱逸，但無明顯的隱居行動。<sup>46</sup>北宋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隱逸思想，多來自於後面四類的隱居型態。

王文進先生曾言：「表面上中國知識分子都無法真正離開仕宦的崗位，但是在心靈深處卻始終保存著隱逸世界的嚮往。」<sup>47</sup>北宋士人無論在朝為官，或因罪貶謫，均未真正脫離官宦之途，但他們卻都嚮往著隱逸生活，故縱情悠遊於園林之中，在恍若天成的山水園景之中，以撫慰其對隱逸生活的憧憬。北宋園林記中屢屢可窺見士大夫對隱逸生活的嚮往之情。北宋士大夫為何嚮往隱逸生活，從徐鉉〈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可一窺究竟：

古人有言：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況于輕鐘鼎之貴，徇山林之心，將相之權不能累其真，肺腑之親不能係其道，道風素範，豈不美歟！<sup>48</sup>

<sup>44</sup> 參閱劉衍等著：《中國散文史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1刷，頁235。引文中所提到的歐陽脩、蘇軾的遊記，其實指的即是「園亭記」。蓋因定義不同，故名稱有異。

<sup>45</sup> 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崇尚隱逸的風氣」。

<sup>46</sup> 參閱劉文剛：《宋代的隱士與文學》，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4-10。

<sup>47</sup> 參閱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臺灣書店，1999年2月初版，頁14。

<sup>48</sup> 《徐文公集》卷14；《全宋文》第1冊，卷22。

原來，一旦入朝爲官，想要脫離仕宦生活就極爲不易，終身將在宦海之中浮浮沉沉，受名利榮辱之羈累。唯有不願從政爲官、追山林隱逸之樂的士人，將可保有其全真之天性。因此，正在仕途上坎坷而行的士大夫，莫不對隱逸生活充滿了嚮往之情。

孔武仲〈蕭貫之挂冠亭記〉亦道出，仕宦不值得慕求之因：

然道之行否存乎時，名之美惡存乎人。捨我之尺度而就彼之繩墨，遇則多憂，不遇則不樂，天機蕩盡，而身亦隨之。然則仕宦不足慕也。<sup>49</sup>

追求仕宦之途者，莫不希冀自己的理念可以推行於世，並求得美好之名聲。但是，孔武仲指出：道之可推行與否須待時勢，名聲之美惡則須待他人之評價，這些都是須捨棄了自我，去遷就外在的標準，並非能由一己之力便可達成。而且一旦得到重用，則有政事須煩憂；若不得賞識，自己則不快樂，人之天性與天真將因此蕩然而無存。所以，孔武仲認爲仕宦不值得慕求。此段文字精確點出了仕宦不如隱逸之處，亦是士人嚮往隱逸生活之因。

葉太平先生也指出：因士大夫的「自性」遭受現實環境的扭曲和壓抑，促使他們傾向回歸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沉澱心靈。

士大夫文人所生活的是「沈濁」的社會環境，人與物的「自性」被扭曲、被壓抑、被污染、被閹割，清高的本性、強烈的自尊心和自由敏感的心靈，使他們要求擺脫和超越塵俗的污濁和腥穢。但他們對自身感性生命的摯戀又使他們不願捨棄現世而追求彼岸，唯一可供選擇的精神去處便是回歸自然，主動地追尋自然，同大自然進行情感的交流，在那裡建立自己的靈魂棲息所。<sup>50</sup>

在大自然之中，士大夫得以脫離世俗的羈絆，找回迷失之本性，返璞歸真。所以，士大夫大多希望能擺脫世俗的塵累，而對隱居於山林自然產生懷抱。

既然士大夫如此希羨隱逸生活，一旦有機會真正脫離宦海，亦能放下榮辱得失，盡情享受隱居之樂：

<sup>49</sup> 《宗伯集》卷12；《全宋文》第49冊，卷2194。

<sup>50</sup> 參閱葉太平：《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正中書局，1994年12月初版，頁157。

得鄰之蕝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曾鞏〈南軒記〉）<sup>51</sup>

曾鞏雖因父親受人誣陷，因而失官歸鄉，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失意，反而在南軒過著隱逸自得的生活。這樣悠閒自在的生活，即使以「廊廟之貴」、「萬乘之富」與他交換，曾鞏也不願意。足見曾鞏不圖富貴、鄙視權勢，淡然自守的隱逸情懷。

但是，並非所有士大夫皆能放棄對仕宦的追求，真正隱居於山林之中。於是，他們建造了有如第二自然的山水園林，隱居於自我建構的樂園。

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於隱歟？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賢乎哉。……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哉，隱居之勝也。（尹洙〈張氏會隱園記〉）<sup>52</sup>

張清臣原本就不是仕宦之士，但其兄乃在朝為官，卻為弟弟的園宅命名為「會隱園」，尹洙認為張兄使君亦有隱居之志。尹洙進一步指出：追求世俗利益者，易心神勞累、行動受到拘束；唯有隱士能內心舒服自得、無拘無束。張使君有志於「隱」，雖然形體未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但心裡不再有所營求，亦是賢者的表現。這經由人為建造的園林，亦可作為隱居之勝地。張使君在朝為官，卻隱於山水園林之中，其「心無他營」，即劉文剛先生所說：「宋人的隱，是從思想上的隱，就把社會看透，把官場看透。」<sup>53</sup>由於現實環境的壓力與逼迫，使得北宋士大夫無法依其心志，捨棄仕途，縱身於山林深谷之中。於是，只好在自我建造的園林天地中，享受近於隱的悠閒適意。

當士大夫悠遊於園林之中，往往帶給他們如入世外桃源之感，並滌盡心中的煩憂，忘懷官場上的奸險爭奪、權利名位，達到無所掛礙的境界。

（1）若夫坐於堂上，則有遠峯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洄，聞鳥之轉，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之戀，此燕息之趣也。（祖無擇〈申申堂記〉）<sup>54</sup>

<sup>51</sup> 同註 43。

<sup>52</sup> 《河南先生文集》卷 4；《全宋文》第 14 冊，卷 587。

<sup>53</sup> 同註 46，頁 9。

<sup>54</sup> 《龍學文集》卷 7；《全宋文》第 14 冊，卷 587。

- (2) 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士之鄉也。(蘇轍〈王氏清虛堂記〉)<sup>55</sup>
- (3) 不奢不陋，既幽既閑。憑軒俯眄，盡濠梁之樂；開牖長矚，忘漢陰之機。(徐鉉〈喬公亭記〉)<sup>56</sup>
- (4) 雖進躁之士，怵迫之人，暫遊其藩，一踐茲境，其心翛然，猶以為已登崑崙，涉閬風，澹然忘歸，有超離昏俗之意。(胡宿〈高齋記〉)<sup>57</sup>

當士大夫暢遊於園林之中時，觸目所見盡山水風物之景，不禁激發其對隱居生活的戀眷與嚮往。祖無擇認為這即是燕息的樂趣。因此，士大夫喜愛悠遊於園林之中，大概是因為可慰藉其在朝為官，多受羈絆，不得隱逸山林享受悠閒自在生活的遺憾吧。當士大夫徜徉在這人間樂園時，可令其忘卻世俗中擾人煩雜之事，心靈得以沉澱而恬靜平和，達到毫無牽掛、自由自在的舒適。〈喬公亭記〉也指出，悠遊於園林之中，憑軒遠眺，可盡享隱士悠然自得的樂趣，並忘懷機心，重抱純真無邪、隨順自然的初始之心。因此，園林對士大夫而言，恍若登臨仙人之境，令其樂而忘歸。園林這一「壺中天地」本是神仙方術裡假託的完足世界<sup>58</sup>，故當士大夫徜徉於這人為建構的樂園時，總有蒞臨仙境之感，以滿足其對隱逸生活之無礙、神仙境界之美好的希慕之情。

因為北宋帝王對隱士的優渥，促使了崇尚隱逸之風。又加以仕海浮沉，官場上爭權奪利，使得士大夫心嚮隱逸。但由於現實環境的限制，士大夫僅能「吏隱」於朝，徜徉於「壺中天地」，在恍若第二自然的山水園林之中，滿足其於隱逸生活的嚮往之情。

#### 第四節 超然物外的胸襟

北宋時期，由於朝政採取崇文政策、提倡儒學，以鞏固帝王的統治，遂也促使儒學得以復興，成為宋文化結構的基礎。<sup>59</sup>而北宋帝王又大力提倡佛、道兩教，

<sup>55</sup> 《欒城集》卷 24；《全宋文》第 47 冊，卷 2095。

<sup>56</sup> 《徐公文集》卷 14；《全宋文》第 1 冊，卷 22。

<sup>57</sup> 同註 16。

<sup>58</sup> 參閱本論文第二章註腳 34。

<sup>59</sup> 許總：《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 年 1 月初版 2 刷，頁 93。

促使佛、道教在北宋均蔚為顯教<sup>60</sup>，其教義、思想與儒家相融合，形成三教合一的局面。因此，道家自然無為、存神養氣的生活態度，和佛教心性自覺、隨緣自適的禪悅情趣，融入了儒士的思想生活之中，形成清淨平和的文化性格和自然適意的人生情趣。而佛、道兩教超越生死、物我、是非二元對立的生存智慧，對北宋士人亦有深刻的影響，使其具有「深於情而不為情所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的清曠胸襟，具有超越物外，無道為一，無往無念而又能隨時隨地大機大用，將生活藝術化的品格。」<sup>61</sup>

因此，北宋士人在面對人事間的榮辱、窮達、得失時，並不會消沉失志，也沒有騷人墨客的貶謫自艾悲情。他們不會因一己的得失禍福而或喜或悲，反而呈現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情懷，無往而不自得的精神境界。

北宋園亭記散文中屢屢可見士人流露出「超然物外」的淡泊曠達情懷。蘇軾於〈寶繪堂記〉中直言如何達到「超然物外」的法則：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sup>62</sup>

原來，不被外物羈絆己心，在於人與物之關係：可以寄情於物，但不可沉溺於物。蘇軾從正反兩面來闡明物我之間的關係：因為若只寄託情懷於外物，即使是微賤之物也能成為人的快樂，而最珍貴之物也不能成為人的憂患。但是，若沉溺於物，則即使是微賤之物也會成為人的憂患，即使是最珍貴之物也不能讓人快樂。

這根本之理，來自於沉溺於物，其心將被外物所役。因此，所得到的快樂並非出自內心的真正快樂，而是藉由外物反應出來的情緒。而這個道理，正是《莊子》書中所言：「不以物挫志」<sup>63</sup>、「不以物害己」<sup>64</sup>。

關於「物我關係」之理，北宋園亭記散文中仍有不少的闡發：

- (1) 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眾者，以能安之也。……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身于己者，朝夕不息。而其外來者，

<sup>60</sup> 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佛道的盛行」。

<sup>61</sup> 參閱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2004年12月2刷，頁8-9。

<sup>62</sup> 《蘇文忠公全集》卷11；《全宋文》第44冊，卷1967。

<sup>63</sup> 《莊子·天地》。

<sup>64</sup> 《莊子·秋水》。

皆有以應之，而不留于胸中。（孔武仲〈安堂記〉）<sup>65</sup>

（2）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其銖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樸，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激激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為民，入與道為鄰。若是，則安往而不逍遙乎？（吳處厚〈逍遙齋記〉）<sup>66</sup>

（3）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夫豈遠哉？生于心而已。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亦未嘗廢也。（曾鞏〈清心亭記〉）<sup>67</sup>

無論是孔武仲，或是吳處厚、曾鞏，他們都體認到一個真理，即是：萬事萬物皆有其一定之法則，君子僅須安於世間萬事萬物改變流轉之勢，而專注於己身內在的道德修養。對於外來之物，君子僅予以相應和，卻不讓外物滯留胸臆，所以萬物不能累其真。吳處厚則認為君子以守真抱樸之心處世，隨世汨沒，亦將無往而不樂、不逍遙。

從孔武仲、吳處厚和曾鞏的看法，可知「輕於物而自重」是「超然」思想的核心<sup>68</sup>。因此，君子必須從一切外在束縛中超脫出來，將榮辱利害、盛衰進退統統置之於度外，「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sup>69</sup>，這樣才能任性自適。

許總先生說：「在宋人看來，事物有其客觀規律，人生也自應遵循這一規律，所以面對人生的遇合，都能經過哲理分析和思考，平靜地對待喜怒哀樂，情感處於一種平靜的客觀的狀態。」<sup>70</sup>這些話正好詮釋了孔武仲、吳處厚和曾鞏的待物法則，而北宋士人超然物外的胸懷，應該就是來自於哲理分析和思考的產物。

<sup>65</sup> 《宗伯集》卷 12；《全宋文》第 49 冊，卷 2193。

<sup>66</sup> 《全宋文》第 35 冊，卷 1518。

<sup>67</sup> 《元豐類稿》卷 18；《全宋文》第 29 冊，卷 1262。

<sup>68</sup> 陳冬梅：〈蘇軾超然思想探析〉，《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頁 80。

<sup>69</sup> 蘇轍〈吳氏浩然堂記〉，同註 55。

<sup>70</sup> 同註 59，頁 50-51。

北宋士大夫在遭逢貶謫和仕途不順遂之時，即以超然物外的曠達胸襟來勉勵自己或友人。蘇轍在〈黃州快哉亭記〉以「心中坦然，無往不快」的道理，來慰勉同是逐臣的張夢得。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sup>71</sup>

蘇轍提出：一個人心情好不好，在於他的內心是否能坦然自適；只要心中坦然自適，不受環境遭遇損傷自己的心性，那麼無論到何處都能怡然自得。蘇轍進而讚揚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憂，自放於山水之間的曠達行爲，以山水美景來自求安適愉快。但是，若非張夢得心中坦然，這些山水風物恐將使騷人思士「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sup>72</sup>的感受吧。〈黃州快哉亭記〉表面上是讚譽張夢得之隨緣自適、豁然達觀，實際上是藉此勉勵張夢得和蘇軾以「心中坦然，無往不快」的道理，去面對貶謫的困境；亦勉勵同遭貶黜的自己，有如此曠達、超然物外的胸懷。

歐陽脩則藉〈游儵亭記〉勸勉異母兄歐陽昉不要因眼前的困頓，而消磨胸中銳氣。

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歐陽脩〈游儵亭記〉）

歐陽脩於文中描繪其兄形象，謂其不以浩瀚長江為大，而建亭於方圓幾丈的小池上，卻不認為狹小，以讚譽其兄的心胸豁達寬大。且歐陽昉對於富貴不動心，身居卑位，卻依然心胸豁達，這才是真正的勇士。在〈游儵亭記〉中，歐陽脩亦是以正面肯定的方式，來鼓勵歐陽昉要超脫懷才不遇、志不獲展的困境，做一名逆

<sup>71</sup> 《欒城集》卷 24；《全宋文》第 47 冊，卷 2096。

<sup>72</sup> 范仲淹〈岳陽樓記〉，同註 19。

境中的勇者。

蘇舜欽因罪罷官，休隱於自建的滄浪亭內，也不因此失志喪意；反而能自適悠遊於滄浪亭內，享受隱逸之趣。

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禾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閩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為勝焉。（〈滄浪亭記〉）<sup>73</sup>

蘇舜欽不為罷官而感到自身不幸，反而認為自己因禍而得一優美園地，試看他乘船高歌，享受著園林野趣，是多麼的怡然自得。蘇舜欽藉著滄浪亭的幽曠景色，使自己的心境淡泊虛靜，因而得以照見自己內外得失的本源。雖然蘇舜欽未能完全忘懷外物，達到真正的超然物外，但其面對罷官逆境，所呈現的亦是一種豁然達觀的積極態度。

蘇軾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而遭到排擠，由杭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府。次年修復北城上高臺，蘇軾據《老子》：「雖有榮名，燕處超然」之義，為高臺命名為「超然臺」<sup>74</sup>。而蘇軾亦自己寫了一篇〈超然臺記〉，呈現其面對困境的灑脫態度與曠達胸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sup>75</sup>

蘇軾自言其生活態度是覺得任何事物都有值得欣賞之處，因此就都可令人感到快樂，不一定要怪異奇特、雄偉壯麗之物。蘇軾並以此類推，指出自己應是無往而

<sup>73</sup> 同註 19。

<sup>74</sup> 蘇軾〈超然臺賦并敘〉：「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軾曰：『此將何以名之？』軾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欒城集》卷 17；《全宋文》第 46 冊，卷 2037。

<sup>75</sup> 同註 62。

不樂。最後再加以說明，蘇轍為高臺命名為「超然」，是要藉此表現蘇軾無往而不樂的原因，在於能超脫外物的束縛。透過〈超然臺記〉，呈現出蘇軾超然於寵辱得失之外，追求精神滿足的達觀態度。

楊勝寬先生認為，人的得失浮沉是主觀意志不能完全左右的，因此只有採取隨緣自適，伺機而行的方式去面對人的現實與未來，才能不失時機地抓住新的希望。而「隨緣自適的一個重要途徑，便是超然於物外以觀物。」蘇軾正是認識到這個道理，才能以樂觀的生活態度去面對人生的逆境。<sup>76</sup>

「超然物外」的曠達胸襟，在北宋園亭記散文中處處可見。這種對人生態度的達觀，來自於佛、道兩宗教的影響，使得北宋士人在面對榮辱窮達、得失盛衰時，不會有消沉失志的悲情。也許士人的內心未能真正達到「超然物外」的境界，但他們透過園亭記散文來自我勉勵，朝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sup>77</sup>的方向努力，也是一種積極樂觀面對逆境的態度。

## 第五節 寓治國勉德之意

「宋代重文的時代風氣，儒學復興的文化背景，以及濃郁的人文文化氛圍，造成宋代文人理性精神的高揚。」<sup>78</sup>由於理學的發展，促使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得以確定。而理學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則是宋詩散文化、議論化，散文則是常寓蘊深刻的哲理內涵，「創作中滲透哲理思辨精神更成為文學創作中的普遍現象」<sup>79</sup>。葉太平先生也提到：在「尚意、尚理的文化氛圍，從而使這個時代成為善思辨、善理性的時代。這種時代精神不可避免地宋代文學中體現出來。」<sup>80</sup>宋代文學則多以思理意趣而取勝。」因此，園亭記散文本是以記錄亭臺沿革之經過、花費之事工，甚或狀寫景物等，均是以記事為主。但因宋代理性精神與思想的影響，園亭記散文中往往寄寓了深刻的意涵和作者的期待。

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於此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寢多，則記體之變，

<sup>76</sup> 楊勝寬：〈蘇軾的人生態度與人生體味〉，《文史哲》，1998年第1期，頁106。

<sup>77</sup> 同註72。

<sup>78</sup> 同註59，頁55。

<sup>79</sup> 同註59，頁49。

<sup>80</sup> 同註50，頁196。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徐師曾《文體明辨》）

北宋園亭記散文以藉題興發的寫作手法來寄寓深刻的意涵，而這興發的對象往往藉由園亭的題名。士人爲園林之中的園、亭、臺、樓、閣等建築物，都有命名，而這命名即寄寓著造園者和園林的審美意趣。「它們是建築物典雅的裝飾品、園林景觀的說明書，也是園主的內心獨白。」<sup>81</sup>正因園亭的題名寄寓著造園者或園主的心跡，所以爲園亭撰寫記文的作家，往往從題名去闡發園主的心聲，或藉以勉勵、勸誡園主。而這些寄寓的內容與期待，略可分爲「修身勉德」和「爲政之道」兩大類。試歸納分析如下。

### 一、修身勉德

士人往往爲其日常所居的齋、堂，或燕遊之園、亭命名時，藉題名以寄寓自己之人格理想，或勉己勵德、修身。於是撰寫園亭記散文的作者，亦會根據題名以闡發義理，或是勉勵園主無愧其園亭之名。穆修在〈靜勝亭記〉中即勉勵園亭主人陳君不要徒然擁有亭名，卻達不到亭名所寄寓之深義。

夫靜之闡，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乃斯勝，心乃誠，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有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愧也。<sup>82</sup>

陳君爲其亭命名爲「靜勝亭」。穆修認爲心神能平靜，則可以克服偏邪不正的視聽與思慮，進而達到心誠，而完成君子之道。但是，如果沒有君子之道，擁有空名也是沒有助益，是無實質的靜、誠內涵，卻守著「靜勝」這個空名罷了，與盜取稱號者相仿。穆修雖讚譽陳君擁有君子之道，所以能擁有靜勝亭；但實質上是藉闡發「靜勝」之義，委婉勉勵陳君和將來擁有此亭的人，不要荒廢職務，將來以擁有「靜勝亭」這個亭名而感到愧疚。

范仲淹在〈清白堂記〉中，對自己有著和穆修相同的顧慮與期勉：

<sup>81</sup> 參閱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頁 197。

<sup>82</sup> 《穆參軍集》卷下；《全宋文》第 8 冊，卷 323。

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sup>83</sup>

清白堂和清白亭的建立，乃是因為官署之側得一甘美之泉井。范仲淹先從《易經》去闡發「井」的意涵，得出井具有清白、有德之義，象徵君子之道。因此范仲淹以「清白」為其亭、堂命名，有勉勵、警惕自己為政要清廉之寄託。亦冀許自己居清白堂、登清白亭時，不會愧對其名。

穆修和范仲淹都不約而同的提到「名實相副」的問題。孔子曾提出「正名」的觀念：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名實不相副，將導致禮樂教化無法推行，刑罰施之不當，最後會使人民手足無措。因此，君子必須慎用其「名」，使其恰如事實，能以順理的說得出來，事情亦必能順利推行。由孔子的「正名」觀念，可以知道為政者必須注意名實相副的問題，以身作則才能治理天下。而園林既作為園主心跡之表白、人格理想之寄託，而給予寓意深刻之命名，其題名就是園主人格的象徵。一旦，園主外在行為表現不符題名之深義，豈不名實不相副，又該如何作為人民之表率，來治理百姓呢？因此，穆修和范仲淹皆從「名實相副」觀點，去勉勵園主或自己要不愧對題名所寄予的意涵。

志古堂是劉伯壽於縣署之側所建構的，他因「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所以命名為「志古」。尹洙嘉許他有此志向，於是為其闡明該如何達到古人之道。

（古人）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如有志於志

<sup>83</sup> 同註 18。

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尹洙〈志古堂記〉）<sup>84</sup>

尹洙認為古人在行事、立言時，並不期待擁有功名與文名，但最後卻都具備了。尹洙勉勵劉伯壽若有心效法古人，則一定要學習古人之道，從心性修養開始，那麼自然就會擁有功名與文名了。

園林雖是作為士大夫於公務之餘的燕息之處，是讓士大夫可以放鬆、休息的地方。但是，士大夫卻往往不敢恣逸、縱情於園林之中，每每以題名警誡自己：

俯而思之曰：「政簡則身閒，身閒則心縱，心縱則放逸。放逸之生，則無所不至矣，或耽於燕飲，或務於嬉遊，或任於性情，或肆於凌侮，千狀萬態，率由茲生，固惟思乎！《詩》曰：「思無邪。」《易》之《艮》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予之為，或偶燕樂，心弛體恣，得不思夫無邪者乎？居官守職，不陵不援，得不思夫不出其位者乎？剗斷民政，臨事裁制，得不思夫患而豫防者乎？總此三者存於心，得不三思而後行乎？予晝居於是，宴食於是，聚同僚於是，事無巨細，盍研諸慮而審思之？……於是革其亭扁，而名之曰「思」；革其堂扁，而名之曰「燕食」，亦欲垂戒勗，不忘於心也。（張紘〈思亭記〉）<sup>85</sup>

張紘擔憂處理的政務單純不繁瑣，身心就會閒散放縱，而耽溺於燕飲、嬉遊，或是放縱性情、欺負侮辱他人。於是以「思無邪」、「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來三省己身的所作所為；並將亭命名為「思」，以警惕、勗勉自己凡事三思而後行。

韓琦亦在〈定州閱古堂記〉中闡明：要在燕處之處以自勉。

<sup>84</sup> 同註 52。

<sup>85</sup> 《全宋文》第 24 冊，卷 1032。

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sup>86</sup>

韓琦提出古人往往能成異政、立奇功，但現在的人卻不行，導因於現在人希望別人對待自己要充分的尊崇，報酬要豐厚而平穩。接著反觀自己，謙稱自己道德仍不足，但國君的俸祿卻很豐厚，因此責任重大。所以在燕居之處，仍以古人之志以自勉。

關於北宋士大夫於燕息之處，以題名來惕勵自己的例子很多，在園亭記散文中處處可見。為何北宋士大夫在一個作為休閒、宴遊的地方，卻要以如此嚴肅的寓意來戒勗自己？大致可從兩方面去推論。其一，雖然，北宋士大夫認為「乘其閒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為政也。」<sup>87</sup>但是，他們也擔心「過佚則志荒而功廢」<sup>88</sup>的問題。於是，遂在宴遊之處，藉由題名來警誡自己，勿耽溺於宴遊嬉戲，而荒廢了職務和自身品性的修養。其二，堂、齋等建築物，是士大夫平日的居所，所以在公務之暇所待的處所，掛上寓意深遠的題匾，有時刻警惕、勉勵自己的用意。

園林是士人理想世界的人間再現，他們徜徉悠遊於園林以寄託其情懷。園林滿足了士人對自然山水的嚮往，也滿足了他們情感的寄託。而在這完足、美好的世界裡，士人也期許自己的品德修養得以臻於至善。因此每每於各建築、景點處，為其巧寓命名，以寄寓自己的心懷，和對自己品德操守的期許勉勵。所以，北宋園亭記散文中常可見「修身勉德」的主題，即是北宋士人冀許自己能在這一美好的境地，達成人格修養的完善。

## 二、為政之道

北宋士大夫往往具有以天下為己任之濟世熱忱，因此，即便在作為燕休之所的堂亭之中，仍為這些園林建築物巧寓命名，寄託自己為政的理想，亦或提醒自己勤政愛民之道。撰寫園亭記散文的作者，亦從題名揣度園主的心跡，藉此闡發園主的從政理想；或是作者提出理想的治政之道，藉以勉勵園主用心治理民政。

<sup>86</sup> 同註 30。

<sup>87</sup> 蔡襄〈杭州清暑堂記〉。《蔡忠惠集》卷 25；《全宋文》第 24 冊，卷 1018。

<sup>88</sup> 田況〈浣花亭記〉。《全宋文》第 15 冊，卷 636。

試看北宋士大夫理想的治政之道為何。

在張俞的〈恤民亭記〉<sup>89</sup>中，提出了兩種不同觀念的治民之道：

（黃士安）曰：「……傳曰：『恤民為德』。又曰：『勤恤其民。』吾職司其位，在恤其不足。至若法行而令一，刑中而賦均，吏肅而民節，奸亡而冤理，賢進而讒退，暴息而善興，固百里之事也。無縱喜怒以亂刑，無徇權寵以忘義，一邑之利若身之利，一邑之害若身之害，以一身為百里之命，其亦庶於治乎！」

黃士安認為理想的治民之道是體恤民情、顧慮百姓所缺乏之事物。而使「法行而令一，刑中而賦均，吏肅而民節，奸亡而冤理，賢進而讒退，暴息而善興」，則認為本來就是縣宰的分內職責。不因個人喜怒來擾亂法則，不屈從於權貴之下而忘義，將縣邑的利害視為己身的利害，那麼幾乎可以稱為善於治政了吧！在這裡，黃士安所提出的是事必躬親、無事不親為的治民之道，然而作者張俞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凡牧民之急，小者守宰，大者輔相而已。小以親之，大以紀之，而君者靜以生之，治天下如此而止矣。凡今之言治者，曰爵不列等，胡民之恤？祿不侈私，胡民之憂？若是者，可謂善謀於治者也。若君之言無乃營營於思慮，役役於仁義，其去今之理道，亦背而趨乎？

張俞認為治理人民者，職位低的是地方官員，職位高的則是宰相。地方官員親自處理人民的問題，而宰相只須管理，國君則是無為而治，治理的天下的方法只需如此。若是像黃士安所言，只過是讓自己勞苦不息於思慮和仁義之間，卻與真正的治民之法背道而馳。

黃士安和張俞對治理人民的方法有不同的見解，最後仍是沒有取得共識。這兩種治民之法究竟孰優孰劣，也許從丁竦的〈希宓堂記〉可窺見一斑。

榜曰「希宓」，意謂子賤之為單父而人不忍欺，是可希也。……宓有不忍人之心，行有不忍人之政，故下不忍有所欺於上，非強明峻責所能致。

<sup>89</sup> 《全宋文》第13冊，卷553。

用至誠以臨於人，人感至誠而化之以自致者也。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況單父也哉！使宓得而進用，其所致未易知也。嗚呼！宓之為治亦至矣。<sup>90</sup>

丁竦為官署燕休之堂命名為「希宓」，即是希慕宓子賤之意。丁竦認為宓子賤有不忍害人心，行不忍傷害人民的政策。所以，在下位者亦不忍對宓子賤有所欺瞞，而這不是強迫或嚴厲的責備所達到的情形。丁竦認為宓子賤以至誠的心來待人，而人們感受到他的誠意，所以不欺瞞他。丁竦讚揚宓子賤善於治政，亦勉勵自己能效法他。而宓子賤除了「有不忍人心，行有不忍人之政」，「以至誠臨人」，其具體的治民方法為何？在《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中，有宓子賤的治政記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原來宓子賤施政善於用人，因此得以享受舒適安樂的生活。而其所任用的人為何可以將單父治理好，即是丁竦所說：宓子賤以至誠之心對待所任用之人。因此，所任用者盡心辦理好宓子賤所交待的事務，而不忍欺瞞他。從這可知，黃士安和張俞所提出的治理人民之道，其優劣何在。

曾鞏在〈思政堂記〉中則是提出「正己而治人」的為政之道：

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

<sup>90</sup> 《全宋文》第38冊，卷1664。

治嘗有易此者也。<sup>91</sup>

曾鞏先從事物的複雜性、時勢變化的無常，和沒有一成不變的應對方法這三方面，指出行事之困難。但只要經過思考，去因應時勢的變化，依循必然之理；那麼事物雖複雜、易疑惑，也都容易處理了。從這強調出「思」的重要。進而，提出「正己而治人謂之政」，主張自己必須先作為州郡的表率，然後才能治理百姓。曾鞏否定了僅限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的吏政，強調親身實踐、為民表率的治民之道。從這可以知道，曾鞏認為好的官吏是要能以身作則，成為百姓效法的對象。

揚蟠在〈眾樂園記〉中，則指出人民之憂樂繫之於上位者：

舒慘之大，係民之休戚曰政，是以政舒則民從以舒，政慘則民從以慘。民舒則樂以嬉，民慘則憂以悲。然則舒之慘之者，係於在上之人，樂之憂之者，均乎一國之民。一國之所樂，凡外之可以寓而嬉者，皆可樂也。在上者奚獨有憂哉！一國之憂，凡外之可以寓而嬉者，適足以為悲也，在上者奚獨為樂哉！<sup>92</sup>

揚蟠認為：法令寬厚，則人民得以安適；但法令嚴苛，則人民就會淒苦。令人民安適、淒苦，決定於上位者，而快樂、憂傷的卻是全國之民。若人民快樂，在上位者豈會獨自憂傷；若全民憂傷，即使有可寄託情感以遊樂的，也足以令人悲傷，在上位者豈會獨自快樂？在這裡，揚蟠指出上位者之政策與決定，關係著人民的憂樂；而人民的憂樂，也與上位者的憂樂息息相關。藉此，以提醒上位者體恤民情。

王安石則是在〈芝閣記〉中委婉的表達出他的濟世思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召有司以詳瑞告者皆勿納。於

<sup>91</sup> 同註 67。

<sup>92</sup> 同註 5。

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祥瑞。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sup>93</sup>

王安石根據真宗、仁宗兩朝對待進獻靈芝的不同態度，以及造成的社會影響，感慨推行教化的重要。王安石指出帝王的好惡，對風俗影響之大；以此諷勸天子改革政治，變化世道。

北宋士大夫往往胸懷天下，憂心國事。因此即便在燕休之所，仍不免要為其巧寓命名，寄託自己為政之道的抱負與理想，藉此表明心跡，或時刻提醒自己不可輕忽於治政之道。北宋士大夫對國事之用心，由此可見。

北宋園亭記散文因為蘊含了多面向的主題和意境，藉此呈現出北宋士人的胸襟與懷抱，對家國的憂心和個人修養的期許等，使其不單只是純粹記錄營建事功的文章，而大大的豐富了北宋園亭記散文的內涵和價值性。

---

<sup>93</sup> 《臨川先生文集》卷 82；《全宋文》第 33 冊，卷 1407。